

清代孙濩孙生平及《华国编》考辨*

何 易 展

内容摘要:清代孙濩孙著有《华国编文选》、《华国编赋选》等,其“以意逆志”的赋学美学批评思想和“赋自诗而文,复约文而近于诗”的赋史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清代赋学理论成就。然作为承载这一赋学思想体系的文献《华国编》及作者生平行藏却多有未发覆者,今就各馆藏信息对孙氏生平及著述著录情况略作考辨与补释,期以补文献馆藏著录之善。

关键词:《华国编文选》 《华国编赋选》 《古赋选》 《唐赋选》

清代雍正年间进士孙濩孙有《华国编文选》《华国编赋选》(以下简称“《华国编》”)、《檀弓论文》、《治河疏》、《广德道中留寄太守丁柱涛》等著述,颇有文名,虽《清史稿》无传,然其生平事历阮元、葛士濬、李元度等皆有所赞记或述闻。其《华国编》可谓清初较有特色的赋学选籍和评点著作,然因刊辑、文献著录与传钞等原因,其文献价值及其经学与赋学成就尚多未发覆者。

《华国编赋选》四卷,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等皆标存二卷,或题作《华国编赋选》,或作《华国编唐赋选》,但据序、跋及其他文献考证,《华国编赋选》当包括古赋与唐赋各两卷,今多家图书馆藏《华国编唐赋选》非全本,其卷数、刊辑、编次等与初刊亦相去较远。

《华国编》充分体现了编者在赋体功能认知与赋史建构理论领域的创树,全编从三个方面深刻揭示了编者的赋学思想:其一,编者认为“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①,揭橥了赋史发展之迹,同时又深刻地包蕴了“赋”与“诗”、“文”之历时性关系思考,在这种关系认知中赋又巧妙地承载着三位一体的文学功能;其二,孙氏着眼于大文学史观及诗、文因素在赋体中的表现性质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W057)、四川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项目(17TD0032)阶段性成果。

①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和时代性,从而进一步深发古、律融契之说以申赋学“正变”传统论;其三,主张“以意逆志”的赋学美学评点方法,不但呼应“赋诗言志”的赋史传统,也使“赋”发乎“应制”而又脱离“应制”从而成为纯文学的典范,这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主张又与清代欲重塑赋体的文学经典地位相融契^①。

就其文献学意义来看,《华国编赋选》是清初较早将赋体以古、律分卷编次的总集性质的赋集,而《华国编文选》则不但裁选非赋名篇之作,而且将所选之文概视为“诗赋体”^②,从选赋实践来看,与清初《历朝赋格》《历代赋钞》《历朝赋楷》《历代赋汇》等颇异其趣,这也为清代中后期分体赋选开启了范式和风气。此前(1686年)虽有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算是专选律体的分体赋选,收录律赋255篇,但孙濩所选唐赋60余篇,却多为钱氏所未选者。而且所录赋篇又多在文本中夹有圈点,或在天头、地脚或赋末附有评注。此书各馆藏的文献著录情况对我们推知和了解孙氏赋学和经学思想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

国家图书馆藏台北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据清乾隆间刻本影印孙濩《是政堂文钞》,此馆藏著者信息标孙濩孙生卒年为1668-1738年^③。此生卒年著录不知所据,然考孙氏著述及相关史料,其馆藏信息对孙氏生卒年的标注似颇有错谬。

《清史稿》无孙氏传记,清代书目文献对其著作总体上也缺乏详细记载。在《(嘉庆)高邮州志》卷之十上“列传”中有孙氏小传^④,然无确切生卒年。不过结合清代阮元《淮海英灵集》及孙濩孙之子孙乔年《华国编文选·跋》等略可窥见孙氏生卒年信息之大概。

阮元《淮海英灵集》录孙濩孙《广德道中留寄太守丁柱涛》诗前作者小记:

孙濩孙,字邃人,号沛村,高邮人,弓安子,八岁能文,十三岁游庠,有神童之目。宗彝讼,系郡狱,濩孙以幼穉奔诉公卿间,见者无不感动。后随侍縲绁,于经史剖悉精微。宗彝卒,遗书字以邃人,谓其能继祖志也。

①何易展:《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对〈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135-142页。

②《华国编文选·例言十七则》:“此《华国编文选》之独登偶体与韵语者,为应制而作也……且应制之体,诗赋为先,诗赋无不用韵,无不用骈,故此选亦谓之诗赋体,非是二者概不登人。”(《华国编文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南京图书馆藏)以下所引《华国编文选》相关文句不再注明版本及出处。

③此影印《是政堂文钞》见录于林登昱等主编的《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九辑),台湾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另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是政堂文钞》六卷(二册)(馆藏索书号GJ88357)。

④《高邮州志》卷之十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23-324页。

年六十始与其子中同举癸卯乡科。己酉应内阁试,世宗宪皇帝特命以中书管司经局正字。庚戌督京右翼太平仓。甲寅引见,奏议停截留漕粮之例以充天庾,复请禁债主赴仓领米以裕兵丁,悉蒙俞旨准行。寻升刑部浙江司主事监,巢西城米厂,白于大司农铁崖史公,递减价直,所济贫民无数。时淮扬叠被水灾,皇上轸念灾邑,下询廷臣,溥孙疏陈河道源流变迁形势,前后近数千言,因议开毛城铺引河事,挂吏议,复蒙圣恩宽宥,供职如常。后以疾归。所著书有《檀弓论文》、《华国编古赋选》、《唐赋选》、《文选》行世。^①

阮氏小记与《高邮州志》卷十“列传”所录孙氏小传大致相同。在《(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十四“选举志”中“雍正二年补行癸卯正科”条下共九十九人,其中即录“孙溥孙,高邮人”^②。清雍正癸卯元年(1723)孙溥孙年六十。逆推,则孙氏当生于康熙二年(1663)^③。雍正元年癸卯前与其子中曾设馆天长讲学^④。雍正己酉(1729)年“应内阁试”。清代会试一般“由礼部备试卷,三年一科,以丑、未、辰、戌年为会试正科”^⑤。孙氏此次应内阁试或为乡科复试,或为会试前之特试^⑥。据其上下文看,己酉内阁试当为特召见试,其第二年(庚戌)会试,试毕,因而世宗宪皇帝特命以中书管司经局正字。此年孙氏约67岁,并拟编撰《华国编赋选》^⑦。

《清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四《经籍考》“《檀弓论文》二卷”下载:“溥孙,字邃

①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6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②《(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2-893页。

③因雍正二年是补行雍正元年停考的乡试正科,若以雍正元年(1723)倒推,则孙氏当生于康熙二年(1663),若以雍正二年视为始六十而中举,则孙氏当生于康熙三年(1664),若以虚岁计,则更前推一年,但生年不会晚于1664年。

④孙溥孙《华国编赋选·凡例》:“是编古赋之评,皆余十年前设馆天长卒业者,时亡男中亦授徒此地。”

⑤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按:商氏又称“乡试三年为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万寿登极各庆典加科者曰恩科”,“雍正七年己酉科顺天乡试奉特旨复试”(第49页、第119页)。

⑥据《清史编年》载雍正元年开“恩科”(6月13日)及“恩科殿试”(11月22日),无正科记载,而雍正二年(11月20日)有载“是科为补行正科会试”,而雍正七年(1729年,己酉)载有特别“开送内阁请旨”,并“命赐举人”的记载,但是年似并未有会试,据“将明年会试取中额数扩至四百名”来看,会试当在雍正八年庚戌。(分别参《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43页、97页、410页、422页。)

⑦孙溥孙乾隆三年《华国编文选序》:“曩官经局曾刊《华国赋选》以问世。”其雍正十一年《华国编赋选序》亦云:“年齿衰老,幸厕内阁之末僚,以司经为专职,文章之事与有责焉。”孙氏任司经局正字,当于雍正七年己酉至雍正十一年左右。

人,高邮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①孙濩孙当为雍正二年中举人,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中进士,此年并任官督京右翼太平仓。清叶凤毛撰《内阁小志》中“同事前辈”条载:“孙濩孙,高邮。予任时已七十馀,为仓差,休。”^②自雍正八年(庚戌)至雍正十二年(甲寅)可能孙氏参与了国家粮库的监督与管理,雍正甲寅(1734)时其年岁确当七十有馀。据《华国编文选序》孙濩孙称《华国编赋选》刊于其官经局时,而至雍正十一年癸丑作《华国编赋选序》亦署为“癸丑长至日内阁中书舍人管司经局正字高邮孙濩孙”^③,孙氏任司经局正字应自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二年止,期间其他官职可能为兼职。雍正十二年甲寅不久升任刑部浙江司主事监,即其子所谓“以司任刑曹”^④,即指官至监察御史。而孙乔年《华国编文选·跋》云:“戊午致仕,由潞河南归,乔年侍奉舟中……归未半载,先君子遽尔见背,所遗稿本藏弃篋中廿馀年矣。”孙濩孙乾隆三年戊午(1738)致仕,时年75岁。大概半年后,即乾隆四年左右卒。

清孙濩孙著述虽不算多,然其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如其《华国编》在陈鸿墀《全唐文纪事》、李调元《赋话》、阮葵生《茶馀客话》中就有评赞。除《华国编》外,另据清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一载有孙濩孙《广德道中留寄太守丁柱涛》诗,孙氏还有《是政堂文钞》六卷行世^⑤。清葛士澐《清经世文续编》载孙濩孙有《治河疏》^⑥,《清文献通考》及《清通志·艺文略》载孙氏有《檀弓论文》二卷^⑦。孙氏《檀弓论文》二卷对《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一段进行了经典性解读,重新断句为:“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郈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清代学者李元度在《天岳山馆文钞》卷三《檀弓说》中极赞孙濩孙以句读新解《檀弓》一章颇有新得^⑧。江永《群经补义》、武亿《读经考异》等均录其说,斯可谓渐成定论。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四,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80页。

②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751册,第284页。案:据叶氏《内阁小志·内阁署》后小字注:“余初到阁时,屋皆半圯,雍正八年九月地动益圯。明年,大清门起至大内,概加缮治。”可见叶氏到内阁与孙氏为同事当在于雍正七年至十二年之间,但据其称为“同事前辈”,或为同事在雍正十一年(1733)左右,故孙氏生年不晚于1663年。

③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④孙乔年:《华国编文选·跋》,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⑤见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是政堂文钞》六卷(二册)(馆藏索书号GJ88357)

⑥葛士澐:《清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一《户政十八》,清光绪石印本。

⑦《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80页。又见清官修《清通志》卷九十八《艺文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0402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1页。

三

南京图书馆藏清孙濩孙(1663-1739)辑《华国编赋选》二卷,清雍正十一年刻本(馆藏索书号 GJ/16836,残本),《华国编文选》八卷(馆藏索书号 GJ/806830),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检各家图书馆著录情况,其题名、篇目、卷数等或颇有异同。据其序、跋、凡例等知《华国编赋选》当共为四卷,今多家图书馆所藏皆标两卷,显然存在著录错谬。

《华国编赋选》刊辑当早于《华国编文选》,从今天的刊本保存情况来看,其有分刊本,也有合刊本,而且《华国编》在当时多有学者引录,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在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引孙氏《华国编》评王勃赋云:“王勃《九成宫东台赋序》‘金石千声,云霞万色’,可驾所作《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上。”^①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云:“孙舍人濩孙选古文《华国编》,专取馆阁一派,颇具规则。”^②从中可以窥见孙氏赋选在清代之流行,然由于此书初刊曾一度中缀,对其刊辑次序、流传等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经查多家地方及主要高校图书馆,目前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西南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等尚藏有《华国编赋选》(或馆藏题作《华国编唐赋选》),而国图、南图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地藏有《华国编文选》,二书著录情况颇为复杂,其中涉及题名、篇目、卷数、册数等或互有异同。仅以《华国编赋选》来看,南京图书馆著录《华国编赋选》二卷两种,其中一种为残卷,一种为《华国编文选》八卷《赋选》二卷合订本(以下简称“南图本”);国家图书馆著录有孙濩孙选《华国编唐赋选》二卷本(以下简称“国图本”);西南大学图书馆著录《华国编赋选》二卷本一种(以下简称“西师本”)。南图本共六册,其馆藏信息题作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然此编文选与赋选两种从版式、字体等比较,似非同时刊刻,故馆藏信息对两部分的出版年月的著录总为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应不太准确,当予分别著录。国图本《唐赋选》的题名当为图书馆整理人员所题,此书版心题名“华国编赋选”。今存国图本、南图本、西师本各二卷,所收实际都只录《唐赋选》部分,故诸本皆非完本。各家图书馆著录情况如下表:

①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六十七,清同治十二年方功惠广州刻本。

②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诗话》,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西南大学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A	B			
华国编 赋选	《华国编唐赋选》二卷本，二册，清雍正间刻本。以下简称“国图本”。	二卷本，清雍正十一年刻本，二册，索书号 GJ / 16836，残本。	文选八卷赋选二卷，合刊本，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六册，索书号 GJ / 16765。以下简称“南图本”。	二卷本，清雍正间刻本，二册。以下简称“西师本”。		
华国编 文选	八卷本，孙馥孙选，孙乔年增辑，天心阁孙氏乾隆二十四年刊本，四册。	八卷本，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三册，索书号 GJ / 806830。	八卷本，清刊本，四册，索书号 GJ / 807833。		八卷本，清刻本，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四册，索书号 0027932	八卷本，孙馥孙辑，孙乔年增辑，林仁振校阅，孙氏天心阁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四册一函。

从南图本和南图藏《华国编文选》两书篇首序言看，《华国编赋选》似当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时孙氏为内阁中书舍人管司经局正字。南图本《序》后仅列《唐赋选》目录，并无《古赋选》部分，然孙氏雍正十一年《华国编赋选序》却称“先刊赋百篇以问世”，与今日所见《华国编赋选》各本所录赋篇数相去甚远，因疑此书有严重阙脱，所记“两卷”之卷数当有误。

孙氏在《华国编赋选·凡例》中对此书编次及选赋义例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其称：

古赋分汉魏以上为上卷，晋宋以下为下卷，次第俱依年代。唐赋则分应制及试帖为上卷，以其于声韵最严，所谓律赋者是也，亦如唐诗之五七言近体，应制者所当奉为科条。其余则自出机杼，犹之诗有歌行、五七古，故别为下卷，使各不相混。则读唐赋者了然于体格之分。至其时代亦略为编次，大约开元、天宝名篇甚多，自元和长庆而后卑靡薄弱，入选者甚少，亦犹选唐诗者，有初、盛、中、晚之分也。

显然《华国编赋选》当有《古赋选》与《唐赋选》两部分，各分上下卷。国图本上下两卷，所选全为唐代赋作，开篇选刘允济《天賦》《地賦》，次阙名《述圣賦》^①，上卷共录唐賦37篇，下卷录唐賦23篇，合计60篇之数，从目录上看末有孙氏

^①李调元《赋话》卷九云“《华国编》不知偃作，而附入阙名”，其论当为谢偃作（李调元：《赋话》卷九，《丛书集成》，第83页）。

《再序》^①，篇目似较完整，国图本与南图本所载篇卷相同，亦为60篇，西师本则计39篇。三本篇数皆与赋序称先刊“百篇”之数相违，也与《华国编赋选·凡例》所述编次略相矛盾。《凡例》云：“兹选荀子《礼赋》一篇以冠集，志其始也。宋玉以下，自汉魏六朝以及于唐，则据《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诸本所载而评订之。”在《凡例》中明确提到《赋选》选录了司马相如《长门赋》：“如司马相如之《长门》，李白之《惜馀春》等篇，皆有忠厚惻怛之意，故略存数篇以志。”今存《华国编赋选》确录李白《惜馀春赋》，然荀赋、宋玉诸赋及司马相如《长门赋》等未见刊选，疑当编次于《古赋选》部分。

另据国图本、南图本及西师本的版式、字体等比较，当为同一版本。由于辑订装帧缘故，各有缺脱。国图本^②分上下两卷，上卷37篇，下卷23篇，据目录末有“沛村孙濩孙再《序》”一篇，然书末未见序文，此编亦当有缺脱。南图本所著录篇目篇数与此相同，无书末“沛村孙濩孙再序”，非完本。西师本题两卷，版宽14.3cm，长18.6cm，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刻“华国编赋选”，页9行，行22字，有圈点，天头有评注。此书无目录，首录《华国编赋选序》，钤印“砺堂藏书”，次录《华国编赋选·凡例十则》，末署“沛村濩孙再述”^③，由孙濩孙之子孙黄、孙穀、孙中、孙乔年同校。西师本上卷为23篇，下卷16篇，末为骆宾王《萤火赋》，较国图本和南图本上下卷都相差极多，下卷后当脱虞世南《琵琶赋》、李白《药》、《笙赋》、韦成庆《灵台赋》、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李邕《春赋》、李白《惜馀春赋》、陆龟蒙《书带草赋》七篇；上卷亦有14篇阙脱。

依《序》及《凡例》所记体例，《古赋选》当为赋选之首，但据三本版式及目录推测，《古赋选》或当刊于《唐赋选》之后，具见下文论述。国图本馆藏题作《华国编唐赋选》，或据赋选目录所记，或因赋选保存实际情况。南图本与西师本都仅录唐赋部分，并阙古赋两卷，据《华国编赋选序》及三本所录赋目推测，古赋两卷篇数当为40篇，古、律两卷合为百篇之数。故今藏《华国编赋选》当著录为“共四卷，缺两卷”。《华国编文选》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共八卷。

四

从序、跋、凡例等来看，初刊时《古赋选》与《唐赋选》并未同时刊刻。在《华国编文选》孙濩孙乾隆三年序中称：“濩孙才识庸浅，齿毛昏落，曩官经局曾刊《华国赋选》以问世，今者乞休归里，击壤林泉，欲更取两汉以来作者之文，分诏

①三本实未见“再序”的文字，疑当附唐赋卷后，古赋卷前，因两卷误裁，各断为单行之本，然因古赋卷失传而此文失之。因而误有将“再序”之名入于唐赋卷目录之末者。

②据国家图书馆网上馆藏目录查询信息载，此书为“9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有眉批，朱墨笔圈点”。是误计还是国图另藏有《华国编赋选》不同版本，待查。

③国图本、南图本目录皆有《再序》，但书末皆无有序文，可见皆缺脱；而西师本脱目录，书末有“沛村濩孙再述”，但此句当为《凡例十则》的落款，疑此“再述”非目录所指《再序》之文。

诰以下骈丽各体为若干卷，品鹭而评论之。”^①此时所刻《华国赋选》是否完整的四卷本呢？因其未标卷数，颇费猜测，从其文字叙述上看，似乎赋选刊辑整个工作到乾隆三年已告竣。

为进一步揭示《古赋选》阙佚之因，有必要了解《古赋选》刊刻时间及次第状况。孙馥孙《华国编赋选·凡例》称“古赋分汉魏以上为上卷，晋宋以下为下卷”，而“唐赋则分应制及试帖为上卷”，“其余则自出机杼”者别为下卷。其对古赋部分的具体编次及义例都作了较为详细而具体的说明：“兹编于古赋之首句或首联用韵者，即注明某韵，如一东二冬之类，或于首句用一东，次句用二冬，即于次句下注明‘冬通’之类是也……唐赋亦照此例，其试赋限官韵者，平侧次序，初无定格，由四韵以至十韵而止，亦于首句韵脚之下注明官韵某字，以便观览。”（《华国编赋选·凡例》）一般“凡例”成于编撰之初或编成之后，具述义例法则。若成于辑成之后，则《古赋选》部分显然也当辑录告竣；而如果凡例成于选辑之初，孙氏在雍正年间已有并选古赋与唐赋的初衷，且对古赋卷具体编排义例都已有详细的计划，如称“兹选荀子《礼赋》一篇以冠集，志其始也”，又谈古赋用韵，兼采《古今韵略》和《古今通韵》，其例甚详。在《凡例》中也谈到此书刊成经过：

是编古赋之评，皆余十年前设馆天长时卒业者。时亡男中亦授徒此地，因命其较正字韵，录成一帙，藏之篋中已十年矣。己酉备员中翰，专管正字，职守颇闲，拟欲选《华国》一编，聊免素餐，因被命督储，无暇及此。今年夏秋间，男黉、乔年请评唐赋授读，因于公馀为之。适同学任君、翼圣同年、吴君仰洙、陶君穉衷、程君栗也，偶相质正，极蒙赞赏，劝付剞劂，苦于无费，亦姑缓之。长男谷作令南康，闻有此帙，远寄俸金，以养厥志，因令梓人速成，就正有道。差期届满，嗣当评及诗文合成《华国》一编，以酬夙志。其实荒谬疏略颇多，内惭海内博雅君子不弃，老耄而教正及之，则余之厚望也夫。

从此段表述的语气来看，《凡例》当作于赋选全部工作告成之后，结合孙乔年跋及孙馥孙自序等，孙氏选辑并刊印了《古赋选》无疑，且前引阮元《淮海英灵集》录《广德道中留寄太守丁柱涛》诗前作者小记亦可证有《古赋选》行世。但《古赋选》何以与《唐赋选》未同时刊印，此从孙乔年乾隆二十四年《华国编文选》后一段跋文中可窥端倪：

先君子之选《华国编》也，欲分诗、赋、文三集以问世，乃赋刊未半而以司任刑曹，寅入酉出，遂中辍焉。戊午致仕，由潞河南归，乔年侍奉舟中，先君子顾谓曰：“解组无事，惟选古自娱，吾归将古赋授梓。”后有事于文，以酬宿志，因检旧所评骈丽之体五十余篇，而作《序》一首以授乔年，曰：“此权与也。”归未半载，先君子遽尔见背，所遗稿本藏弃篋中廿余年矣。

^①孙馥孙：《华国编文选·序》，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由此明确三点:一是《赋选》的整个选辑工作于雍正十一年之前已完成;二是《古赋选》与《唐赋选》未一次性刊行。三是《华国编》体例宏整,欲辑诗、赋、文三集,《诗集》未果。其《凡例》所谓“因被命督储,无暇及此”,当是指雍正八年“庚戌督京右翼太平仓”事,故其于雍正十一年夏秋间全部《华国编赋选》辑录工作告竣,其《华国编赋选序》成于雍正十一年夏至(癸丑长至日),而《华国编赋选·凡例》有“今年夏秋间”及“沛村漫孙再述”之语,《凡例》当成于数月之后。同年(雍正十一年)始刊《唐赋选》部分,其刊行可能历时近半年。而《华国编古赋选》由于雍正十二年之后“司任刑曹,寅入酉出”而未及刊印,至乾隆三年左右才刊行。

按《赋选·凡例》,其古赋当列《赋选》之首,且古赋卷本已在其天长设馆讲学时已录成帙,何以不先刊《古赋选》?此与孙氏选赋宗旨及乔年所请授读有关。孙氏选赋以合应制为目的,故以骈丽为宗,其在《华国编文选·例言》中就交待了选骈体为主的特色:“此《华国编文选》之独登偶体与韵语者,为应制而作也。应制未尝无散行,而骈丽为多。”^①从其独选唐文而不录宋体可以见出,孙氏极为强调应制为宗的主旨,“其不及宋者,盖唐以诗赋取士,字栴句比,声谐律协,规矩裁制,无以复加。况今时应制之作律赋居多,尤当取法乎唐宋人,文赋未免矫枉过正,于律不合”^②。在孙氏看来唐赋是律体较好的代表,而宋赋趋近于文,这或许为雍正十一年先刊《华国编赋选》唐赋卷的理论体认和深层心理原因;而外在的推因则在于其子孙黉、孙乔年等请其评授唐赋。如果分卷刊印,这种先后本来无关紧要,然因雍正十二年孙氏升迁,公务繁忙,赋选刊印不得不暂停,这就造成了赋选版本、版次、流传等诸多问题。孙氏在甲寅(雍正十二年)被提升为刑部浙江司主事监,乃因公务繁忙而“寅入酉出”,且此时孙黉年岁已高,故刊赋工作不得不中缀。而这一系列变故皆出意料之外,故在雍正十一年《序》及《凡例》中未能勘破,因此序例与该书刊存实况略相违逆。其初刊题作《华国编赋选》,本欲包古赋、唐赋各卷,故序称古赋、唐赋两编。至乾隆三年孙氏归里,欲续刻《古赋选》及《文选》,《古赋选》与《唐赋选》便各成单行本行世,此从阮元《淮海英灵集》及《高邮州志》孙氏列传书目中可见^③。《古赋选》刊成后,又欲取两汉以来“诏诰以下骈丽各体为若干卷”^④而成《华国编文

①孙乔年:《华国编文选·例言十七则》,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按:孙氏显然又不是简单地排抵古体,从其选文和赋序、凡例等来看,又明显地蕴发其以古融律的思想。

②孙黉孙:《华国编赋选·凡例》,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③另从今各馆藏本《华国编赋选》来看,其版心上题“华国编赋选”,下题“唐”,可知其初衷《华国编赋选》本欲包括《唐赋》和《古赋》两编,但由于刊印先后失次,却使《古赋选》与《唐赋选》单行传世,故如阮元《淮海英灵集》诗注所称。

④孙黉孙:《华国编文选序》,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选》，但其仅选评约五十余篇^①，未竟而卒。其后近二十余年，其子孙乔年乃在旧评基础上增辑，并于乾隆二十四年刊行《华国编文选》。

五

综上，孙氏《华国编》不失为清代优秀的赋选集，其赋学思想与理论至为丰富，其生年当不晚于1663年，卒年1739年。其《唐赋选》刊于雍正十一年，《古赋选》刊于乾隆三年左右，《华国编文选》刊于乾隆二十四年，《华国编诗选》未及刊辑。由于孙氏乾隆四年突然离世^②，家人一时沉浸于悲痛之中，《华国编古赋选》因此未及大量刊印。之后其子乔年主要是为“继先君子未竟之志”，故成其未完稿《华国编文选》，加之孙觐、孙乔年曾“请评唐赋授读”，古赋相对而言，未有精审兴会之致，对唐赋反而更为欣赏；此外，孙氏分编《唐赋》之后，至乾隆朝由于考赋和八股文之趋，士人亦渐重律体，诸种原因导致《古赋选》流传未广，此后可能也未重刻再印《华国编古赋选》。孙氏初衷欲将唐赋与古赋合为《华国编赋选》，故乾隆三年《古赋选》刊成后并未重新对《古赋选》作“凡例”之类，或有“再序”及跋语当保存于“古赋选”部分，今已不可见。被裁而成单行本后，无序及凡例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华国编古赋选》的传播与接受远不及《华国编唐赋选》与《华国编文选》，加之刊印量少，从而渐至于没。南图馆藏《赋选》（唐赋）与《文选》合刊本也非孙氏（孙乔年等）所为，当为后来编者所串缀，此时《古赋选》或已失传。

【作者简介】何易展，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辞赋学、中国文化史。

①今查《华国编文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本录“天心阁评”篇数23篇，国图本录“天心阁评”39篇，南图本（GJ/806930、GJ/16765）两种分别为44篇和46篇，另有单行本（GJ/807833）未及查证篇目，其为四册。南图本（GJ/16765或GJ/807833）较接近于全本。其46篇之数较接近“五十余篇”之数，孙乔年之语可信。

②孙乔年：《华国编文选·跋》，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